

13.5.2 北大核心、CSSCI 以上期刊发表的科研论文佐证

基于 CGE 模型定量探析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袁嫣

贸易与环境

《国际贸易问题》2013 年第 2 期

基于 CGE 模型定量探析碳关税 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袁 嫣

摘要: 碳关税是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为保持本国经济对其他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文章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 模型, 在生产模块、对外贸易模块、收入支出模块、碳关税模块等模型相互嵌入式的构建, 定量探析碳关税对我国对外贸易、总体经济、生态环境、不同省区经济的影响, 进而得出碳关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经济生产等方面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而在生态环境改善下影响甚微, 其实质是一种保护本国经济、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壁垒。

关键词: CGE 模型; 碳关税; 国际贸易; 碳排放

一、引言

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中改变了以往明显优越的金融环境, “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经济格局面临沉重打击。在经济格局未见明朗的情势下, 发达国家以美、英、法等国为首以保持与促进本国绿色产业体系发展之名, 在 2009 年共同提出“边境税调整”措施 (Border Tax Adjustments, 简称 BTAs), 其中, 最著名的就是“碳关税”。碳关税的征税一方面在于防止“碳泄露”, 即防止碳排放向低成本的国家转移, 进而不利于全球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是保持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即通过碳关税的征收以扭转长期以来国内严格碳排放限额措施所造成的企业成本的附加, 以保持企业的竞争力。然而我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在我国消费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使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成为当前与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问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解决高耗能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技术水平落后的制约将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优先解决的题域, 在“碳关税”征收的国际背景下, 探析碳关税对中国的影响是应对国际挑战、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要课题。CGE 模型也称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被广泛应用的政策模拟分析主流模型。自碳税政策的实施, CGE 模型也相继应用于碳税政策对能源系统、温室气体排放、进出口、投资、消费、GDP 等一国宏观经

股权调整型对赌协议履行的思路与实践——基于一起合作股权投资案例的分析. 财务与会计. 2015. 吴冬才

财务与会计 本期专题
Finance & Accounting

股权调整型对赌协议履行的思路与实践

——基于一起合作股权投资案的分析

吴冬才

一、一起合作投资案例引出的问题

2011年1月18日,A公司(以下称为融资企业、目标企业)、A公司股东15人(均为自然人,其中有1人持股达80%,以下统称为原股东)与B创投公司(以下称为投资方)签订《合作投资合同》,A公司原注册资本500万元,整体作价12 000万元,投资方投资4 000万元,增资后A公司总体作价16 000万元,其中投资方投资的4 000万元认购本次增加的166.67万元注册资本,占本次增资后总注册资本666.67万元的25%,原股东占增资完成后A公司的股权比例为75%(15位原股东持股比例按原有比例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合同条款2.3约定:若A公司2011~2013年三年经审计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小于2 000万元、3 000万元、5 000万元,则增资前A公司整体作价为7 428.5714万元,投资方投资4 000万元,增资后A公司总体作价11 428.5714万元,投资方持有A公司的股权比例调整为35%,原股东持有A公司的股权比例调整为65%(15位原股东持股比例按原有比例进行相应调整)。2014年2月,A公司没有完成合同约定的三年利润指标,原股东(增资后A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按合同约定调整股权比例,即投资方股权比例增加10%至35%,原股东股权比例减少10%至65%。

上述《合作投资合同》属于常见的对赌协议,其中的条款2.3属于对赌条款,即收购方(投资方)与出让方(融资企业及原股东)在达成并购(或者融资)协议时,在信息不对称、未来盈利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一种约定。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投资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如果约定的条件不出现,则出让方行使一种权利或者投资方不行使权利。常见对赌协议类型有股权调整型、股权回购型、货币补偿型、股权稀释型、控股权转让型、股权激励型和股权优先型等。结合本案例合作投资合同具体内容来看,其显然属于股权调整型对赌协议,即协议主要约定:当企业未能实现对赌目标时,原股东将无偿(或者支付极少对价)调整一部分股权给新股东,约定(触发)的条件为财务绩效目标。

二、股权调整型对赌协议履行的思路与分析

在本案例中,《合作投资合同》中的对赌条款该如何履行?双方股权比例调整涉及到的相关会计、税务和法律问题该如何处理?笔者就本案例处理的实际工作思路分析如下:

1. 无偿捐赠

即原股东通过无偿捐赠将10%股权转让给投资方,以补偿投资方由于目标企业财务绩效未达到合同约定而遭受的利益损失,实现合同中对赌条款约定

的股权调整比例目标。按照该思路,合同主体各方会计处理如下:取得10%股权捐赠利得的投资方按公允价值记为营业外收入,并调增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捐赠10%股权的原股东记为营业外支出,并调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目标企业调整所有者权益中投资方的实收资本为233.337万元($166.67+666.67\times 10\%$),原股东的实收资本为433.333万元($500-666.67\times 10\%$),从而达到投资合同中条款2.3对股权结构变动的要求。但投资方取得10%股权捐赠利得必然涉及到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问题,而赠与10%股权的原股东作为非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也不得在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可行性分析:表面上看,在目标企业财务绩效不达标时所进行的以上股权比例调整中,投资方并未支付任何对价即获得了股权,具有无偿性;同时,投资方仅有获得股权的权利,原股东仅有转让股权的义务,具有单务性,形式上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要件。但若认定为赠与行为,笔者认为与对赌协议的经济实质相违背。因为在合同签订之初,双方对于目标企业未来的业绩是否增长是无法确定的,这就可能存在高估或低估企业价值的情况。本案例中赠与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业绩增长不达标,投资方行使估值调整权利,以弥补原股东高估目标企业价值给投资方造成的损失,这明显与《合同法》中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单务性

金融发展、市场地位和税收规避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 付佳¹, 刘慧^{2,3}

(1.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15; 2.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3.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清远 511510)

[摘 要] 基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市场地位和税收规避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市场地位与税收规避程度显著正相关, 同时相比于金融发展水平较好地区, 金融发展水平较差地区的企业其市场地位与税收规避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 市场地位越高的企业税收规避的动机和能力均较高, 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会加剧市场地位较高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因此, 提高我国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降低企业进行税收规避的动机, 达到规范我国财税体制的目的。

[关键词] 市场地位; 税收规避; 金融发展; 融资约束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9)04-0084-06

一、引言

已有文献表明, 企业的微观特征和外部环境会影响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王永培和晏维龙(2014)通过设立修正的会税差异指标发现制造业的产业集聚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 企业规模与税收规避程度显著负相关, 处于发达地区的企业其税收规避行为更加活跃。刘行和叶康涛(2014)建立了四个税收规避指标, 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 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而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规避。毛程联和吉黎(2014)研究表明两税合并提高了外资企业的实际税率, 因此, 外资企业出现了较多的税收规避行为, 其中, 盈利较好的外资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较大, 而大规模的外资企业其税收规避程度较小, 与其他外资企业相比较, 那些外商独资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最高。陈东和唐建新(2012)通过研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公司税收规避程度之间的关系, 为公司税收规避会产生代理成本这一论点提供支持证据, 研究发现企业的高管薪酬和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并且这一显著的关系在较差公司治理的企业中会更加显著, 另外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与会计信息披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 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上升可使税收规避与会计信息披露

质量间的负相关关系得到缓解。张天敏(2012)研究了管理者与企业税收规避行为, 分别考察了管理者激励与企业的税收规避, 管理者个体效应与企业税收规避以及税收征管力度对管理者税收规避决策影响, 研究表明对管理者实行以股票为基础的激励报酬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 管理者个体效应如管理风格和任期长短对企业税收规避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但管理者个体效应如高管年龄、性别、技能以及学历背景等等对企业税收规避决策没有显著影响; 税收监管力度会负向影响管理者激励, 管理者个体效应与企业税收规避决策的关系。王静、郝东洋和张天西(2014)的研究表明公司税收规避会加剧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 公司整体治理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税收规避的代理成本, 减少税收规避下的管理者寻租行为。

而从宏观视角而言, 税收规避毕竟不利于建设规范的财税体制, 引起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财政赤字加剧以及公共资源配置扭曲等(Eisenhauer, 2008), 从而阻碍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 研究企业微观特征和外部因素对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基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的市场地位对税收规避的影响从而进一步丰富这一部分研究文献。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 考察企业的市场地

收稿日期: 2018-09-22

网络出版网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81030.1132.002.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8-11-01 11:08:54

作者简介: 付佳(1988-), 女, 湖南邵阳人, 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 刘慧(1983-), 女, 湖北襄樊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

大数据背景下云审计平台系统的构建

赖丽珍

摘要：在以云计算为基础支撑、大数据为业务引擎的大背景下，传统审计的内容、模式及风险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面向大数据的“云审计”创新模式。本文基于“云审计”模式，从系统集成的角度出发，设计出“云审计”平台的系统架构，并分析了面向大数据的ETL、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处理、数据挖掘、智能引擎和SOA服务等关键技术。

关键词：大数据；云审计；系统架构；审计模式；数据挖掘

“云审计”平台是一个实现各类审计信息数字化，促进信息交互和共享，使审计资源得到充分优化利用的综合性平台。本文从数据采集转换、数据存储管理、多维数据建模、数据分析挖掘、审计业务管理、在线函证服务和信息安全体系七个方面来构建云审计平台系统（见图1）。

一、数据采集转换

1. 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

审计机构必须遵循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接口从被审计单位采集数据，如《国家审计数据规划》、《审计数据接口标准》、XBRL（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等。随着被审计单位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ERP系统的应用也逐渐普及，非结构化数据交换一直是企业信息系统

与审计系统互联互通的瓶颈。近年来，XBRL的应用为企业非结构化数据交换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2002年以后，财政部、证监会等单位牵头推动了XBRL的发展，并发布了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的通用分类标准，要求在上市公司试行。被审计单位将XBRL与自身信息化工作相结合，可统一企业内部数据标准；而审计机构则能够更高效地采集审计数据，尤其是非结构化的财务数据，更加有利于对非结构化审计数据的线索分析和相关风险评价及应对。

2. 数据ETL过程

审计数据分析要求数据环境良好，结构稳定，因而需要对不完整、错误或重复的原始数据进行抽取、清理、转换和装载，即ETL过程，以此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这是联机分析处理、审计数据挖掘的基础。审计数据ETL过程可以选取SAP Business Information Warehouse、Oracle Warehouse Builder、Microsoft SQL Server DTS和IBM InfoSphere DataStage等ETL图形化工具，配合SQL脚本方式，提高数据ETL的开发效率和灵活性。

二、数据存储管理

1. 元数据库

信息化条件下，审计数据越来越向大数据、异构性、动态化和分布式的方向发展。云审计平台建立的元数据库处

于数据存储管理体系结构的底层，提供关于数据仓库、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平台、审计项目数据库和审计资源库等的内容、质量、状况和其他关键属性的描述信息，与所有共享的审计数据资源建立索引联系，然后将它们公布，便于审计数据发现和利用。

2. 数据仓库

许多被审计单位的信息系统由多个异构的、自治的和分布的大型数据库构成，给审计机构访问和分析数据带来了挑战。数据仓库来自多个异构数据源的信息进行复制、预处理、集成、注释和汇总，并重新组织到一个语义一致的数据存储中。大部分数据仓库只存放历史数据，审计数据也是以历史数据为基础；数据仓库和审计数据分析大部分都是面向只读操作，不需要操作事务处理和并发控制，能够支持高性能的复杂的多维查询。因此，云审计平台需要按照汇总和聚集机制，建立面向主题、集成、稳定、时变的审计数据仓库，用以支持自动化审计数据分析和挖掘过程。

3. 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平台

在审计过程中，通过核查企业内控制度、年度审计报告、工作报告、会议纪要、资产评估/变更/转让文件、收发公文、凭证、招投标文件等非结构化审计数据能挖掘出大量审计线索。这些非结构化数据格式包括Word、Excel、PDF、PPT、TXT等多种文件格式。现行

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姚雪松, 方勇华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广州 510515)

摘 要:我国正处在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时期,文章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金融规模的增长对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住房问题和就业问题的解决、促进农业产品和农村劳动力剩余方面均具有正向影响。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系统中存贷款比率上升对城镇化具有负向的影响,表明我国存贷款率上升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会对城镇化推进不利,应加强存贷款比率上升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的防范和管理。

关键词: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系统效率;城镇化;System-GMM估计

中图分类号:C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7)13-0168-03

0 引言

世界经济结构一直处在深度调整当中,对我国出口需求将产生长时间持续性的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关键时期,城镇化对于推动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扩大内需的必要条件,从而对我国各地区当前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成为了当前我国的重要议题。本文将运用最新的数据和合适的方法,进行我国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为促进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

1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1.1 模型设定

通过文献和过去的理论分析^①“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发展可以为城镇产业发展、城镇就业和住房问题的解决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提高城镇资本利用效率等方面。由于提供资金的多少主要受金融规模大小的影响,而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则主要受金融效率状况的影响,因此本文在进行我国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实证分析中,以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指标来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状况。考虑到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扩大和提高不仅对当时的城镇化进程有影响,而且还会对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城镇化进程都有影响,所以我们不仅将当期

的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作为本文设定模型的解释变量,而且还将若干前期金融发展和金融效率状况作为解释变量。此外,考虑到城镇化一旦开始,就会出现对未来城镇发展产生人口的聚集效应,所以我们将城镇化的上一期的城镇化水平也加入到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同时加入了一些对城镇化有影响的控制变量,建立了如下模型:

$$city_{i,t} = c_i + rcity_{i,t-1} + \sum_{j=1}^{P_1} e_j FGM_{i,t-j} + \sum_{m=0}^{P_2} f_m FXL_{i,t-m} + X\beta + u_{i,t}$$

其中, $u_{i,t}$ 为随机误差项, c_i 、 r 、 e_j 和 f_m 为参数; $city$ 代表城镇化水平, FGM 代表金融规模, FXL 代表金融效率, P_1 、 P_2 代表若干前期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状况的期数, X 代表了一组控制变量。由于政府收支、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会对城镇化有较大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了这几个变量加入到设定的模型中,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1.2 变量选择

(1)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指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以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升的过程,因此我们选择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城镇化水平的代理变量,记为 $city$ 。

(2)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关于本文模型中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变量的度量问题,我们沿用姚雪松、兰桂华、刘慧(2016)^②的分析思路 and 做法,认为以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资金融通仍然是以银行系统为主,银行的资产规模可以大概代表我国当前的金融规模,而银行存款向贷款转化的效率则可以总体代表当前我国的金融效率。因此本文设定模型中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变量分别以银行贷款规模占当地 GDP 的比重和银行存贷款比率来度量,分别记为 FGM 和 FXL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47309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90175)

作者简介:姚雪松(1983—),男,贵州铜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

转型期后发企业核心能力构建研究——格力电器朱江洪的管理之道. 管理学报. 2019. 刘朔、蓝海林、柯南楠

第16卷第9期
2019年9月

管理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16 No. 9
Sept. 2019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9.09.001

编者按: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伟大历史时期,为全面探析和解读中国优秀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本土杰出企业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促进中国管理学者开展“立足本土,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本刊从2019年第9期开始,将在“管理学在中国”栏目下专设“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专栏。该专栏聚焦中国管理研究与企业实践,针对中国企业及企业家在各阶段面临的挑战和具体问题,梳理企业家的某个方面管理思想的形成与演化,洞悉企业家思想对企业发展成长的作用机制,从而揭示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思想特点和管理理论。“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作为本项征稿活动的战略合作伙伴,将为该专栏提供支持并为优秀研究成果提供奖励。本刊也将诚邀各方同道,汇聚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共同为“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研究搭建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践行党中央提出的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探索构建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路径,更好地促进中国管理研究与企业管理实践的融合与发展。“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专栏第一期将刊发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以飨大家。此外,本栏目还将设立专家委员会,以及不定期举办工作坊和学术研讨以推动相关活动的深入开展。最新征稿启示请见专栏文后。

转型期后发企业核心能力构建研究

——格力电器朱江洪的管理之道

刘朔 蓝海林 柯南楠

(1.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 华南理工大学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心)

摘要:采用纵向案例方法,以过程研究为视角,在梳理各阶段内、外部环境变化与具体管理挑战的基础上,通过对朱江洪两类战略决策及其在后发企业逐步构建核心能力作用机制上的剖析,提炼出具有特殊情境价值的管理思想。研究结果发现,该管理思想贯穿格力电器实施赶超的3个阶段,有效地应对了中国情境的双重影响,使格力电器在制造、研发、渠道等多个价值链关键环节以独特的“格力模式”构建了多种关键竞争优势,是通过专业化经营成功构建企业核心能力并赶超国内外领先企业的经典案例。通过对朱江洪管理思想的提炼与解读,丰富了后发企业核心能力构建的相关理论,为中国转型期企业核心能力构建的逻辑思路提供了有利的实践证据,也为中国后发企业赶超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企业家; 管理思想; 后发企业; 核心能力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4X(2019)09-1265-14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re Competence of Chinese Later Comer Firm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 Management Thoughts of Entrepreneur ZHU Jianghong of GREE Electric Appliances, Inc.

LIU Shuo LAN Hailin KE Nanna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Adopts the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method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research,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the specific management challenges in each stage, the research analyzes Zhu Jianghong's two types of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modes and excavat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latecomer

转型期中国企业核心专长构建机制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蓝海林、刘朔、黄嫚丽、曾萍

评论·改革开放40年

转型期中国企业核心专长构建机制研究*

○ 蓝海林 刘朔 黄嫚丽 曾萍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中国企业战略管理领域,核心专长是被研究与应用最多但却最模糊的概念之一。在实践中能够有效构建核心专长的中国企业少之又少,在理论上对核心专长构建过程的研究存在着缺乏战略视角与情境嵌入研究的不足。本文分析了核心专长概念形成过程,厘清核心专长的概念,剖析了核心专长概念的内涵结构,强调核心专长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在回顾理论界对核心专长构建过程研究基础上,提出转型期中国情境特征对核心专长的构建过程具有双重性影响,企业家在平衡与应对外部情境双重性中所形成的四种特质构成了中国企业构建核心专长的关键驱动力;提出转型期中国企业在该驱动力影响下形成的核心专长构建机制,包括过程模式、知识来源、管理模式与关键成功因素。这一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深化了已有的核心专长概念,丰富和发展了核心专长构建这一核心战略研究命题的相关研究,对指导当前中国企业有效构建、发挥和强化核心专长,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核心专长;构建机制;战略承诺;转型期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5JZD020)、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8A0303135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7YJA63006)资助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国内甚至在全球市场上都具有核心专长(Core Competence)的企业。面对经济新常态的影响和转型升级的压力,核心专长的作用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具体理解核心专长的概念和内容,把握中国情境下有效构建、发挥和强化核心专长的机制。从理论层面来说,已有文献对完全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核心专长构建机制提出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但这些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情境;有关中国企业核心专长构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前置因素相关关系的验证,导致对中国企业核心专长构建机制的认识依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核心专长性质和特点的认识主要源于西方管理学者的研究,其中能够取得共识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关于核心专长特征的表述,而对核心专长的概念内涵和内容结构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过分强调核心专长的特征已经使核心专长被误认为一个绝对或者普适性的概念。第二,目前国内学者对核心专长构建的研究主要沿用了西方企业战略管理学采用的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视角,重点是相关知识获取和各种能力形成的机制,所取得的成果相对比较零散和微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核心专长构建过程、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第三,有关核心专长及其构建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西方情境为背景展开的。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学界还没有将有关核心专长构建的研究嵌入中国情境之中,未能揭示影响中国企业有效构建核心专长的情境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面对上述实践问题与理论研究缺口,本研究基于对已有文献的回顾与理论思辨,深入分析了转型期中国独特情境特征及其对中国企业核心专长构建的影响,提出转型期中国企业核心专长的构建机制。

一、核心专长的概念源起及其内涵剖析

无论是在战略管理理论界还是实践界,核心专长目前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1][2]}对于这个概念,目前使用的人多,理解的人少;知道其特征的人多,掌握其内容构成的人少;明白好处的人多,知道局限性的人少。当前,中国很多企业在高度多元化或大跨度转型升级中

中国企业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股权的关系研究

黄嫚丽^{1,2} 张慧如^{1,2} 刘朔^{1,2}

(1.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 华南理工大学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心)

摘要: 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事件的二手数据,探讨并购经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比例决策的影响,并研究文化距离与研发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决策经验,并购经验具有情境边界,跨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股权比例负相关,母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股权比例决策并无显著影响;文化距离越大,使得具有同样跨国并购经验的企业选择的跨国并购股权比例越低;主并企业母国研发能力对跨国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股权比例之间的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在母国并购经验高的企业中,研发能力低组比能力高组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较高的股权比例。

关键词: 跨国并购股权; 并购经验; 文化距离; 研发能力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4X(2017)08-1134-09

Merger and Acquisition Experiences and Ownership Decisions of Cross-Bord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 Chinese Firms

HUANG Manli ZHANG Huiru LIU Shuo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ffection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M&A) experiences on the ownership of Cross-bord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CBM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it also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cultural distance (CD) and the R&D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second-hand data of the CBMA even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M&A experience as a type of the decision-making experience has contextual boundaries. The overseas M&A experience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CBMA equity share ratio, 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M&A experience and the CBMA equity share ratio. As CD becomes greater, enterprises with the same overseas M&A experience are likely to choose lower CBMA equity share rates. The R&D capability of the acquirer does not have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the CBMA equity rates, but regarding to those enterprises with relatively high domestic M&A experience, enterprises with weaker R&D capability prefer to have higher CBMA equity shares.

Key words: ownership of cross-bord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CBMA);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 experience; cultural distance; R&D capability

1 研究背景

跨国并购已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近年来,跨国

并购的数量和金额激增。2003年中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实际交易额为8.34亿美元,而到2016年实际交易金额达到1072亿美元^①,出现新一轮热潮。然而,在这一热潮下,关于跨

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中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朱 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45)

摘 要: 农产品在广东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对目前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现状的分析, 发现广东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在谷物、肉类和水果蔬菜上存在竞争优势, 在农机产品、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合作和海产品上存在互补性差异, 据此从政府、农业企业、贸易企业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东盟; 农产品贸易; 竞争性; 互补性

中图分类号: F75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94 (2012) 07-0067-12

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一直是广东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研究的核心领域和重要课题。研究一方面集中于讨论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有多大, 另一方面则关注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

围绕这两方面的问题, 国内外的研究有很多。多数学者认为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但同时也存在互补性, 并且随着广东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互补性越来越明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逆差逐步增大, 广东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在逐渐减弱, 而东盟农产品竞争力在逐渐增强。其根据在于自 2001 年开始, 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况, 并且逆差逐渐递增, 这种差距是由于东盟的区域优势, 短期内难以扭转。和文华、谭丞 (2010) 和姜元武、庄丽娟 (2008) 的文章都对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进行了研究, 前者研究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为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后者研究的是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由以前的产业内贸易为主转变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双边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加强。

本文在分析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现状的基础上, 运用 2000~2010 年统计数据, 沿着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路, 探讨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竞争优势, 通过贸易竞争指数分析研究广东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可行性。

我国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机制探究

朱惠^a, 潘琦^b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a 南国商学院; b. 经贸学院, 广州 510545)

摘要:文章基于人民币汇率的视角, 利用 2001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的国内相关经济金融月度数据, 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 VAR 函数等计量方法, 探究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汇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机制以及传导效果。

关键词:货币政策; 人民币汇率; 传导机制; VAR 函数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2)16-0147-02

0 引言

由于长时间以来,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极不完善, 汇率波幅很小,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汇率渠道不如财富效应等其他渠道畅通, 目前我国基本没有对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的深层次研究。汇率传导途径仅仅是作为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中的一个模块进行探讨的。

宋清华(2003)认为由于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管制, 浮动不足, 所以汇率渠道在我国并不畅通。杨小娟和熊勇刚(2004)利用 1991.1~2002.6 的国内月度经济数据, 借助定性分析, 采用协整理论实证得出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股票价格、汇率和预期三大渠道共同传导的结论。盛朝晖(2006)采用 1994~2004 国内年度经济数据, 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发现信贷渠道和信用渠道为主, 利率渠道居中, 而汇率渠道却相当被动。唐安宝、何凌云(2007)认为汇率变量对产出、国际收支和物价等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汇率渠道并不通畅。王振杰和陶士贵(2009)采用 1994~2008 季度数据, 利用协整检验和格

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得出结论: 信贷渠道是主力, 货币渠道协同发挥作用, 而利率和汇率渠道仅作为辅助及补充。

目前国内在讨论我国汇率传导途径是否畅通时, 大多忽略了货币政策对汇率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存在多大影响。国内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一大特点就是外汇管制开始逐步放松, 开始了汇率形成机制的渐进性改革, 汇率变量的作用逐渐凸显。为了使得研究更加系统全面, 必须加入对汇率渠道的阐述。

1 框架与变量选取

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渠道大致如下: 货币供应量→汇率→净出口→产出。因此在分析汇率传导渠道时相应地需要选取货币供应量、汇率、净出口额和产出值指标。

在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指标选取上, 本文以广义货币供给量 M2 作为统计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在汇率的统计指标选取上, 本文选择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F 来衡量, 数据源自国际清算银行(BIS)网站公布的汇率报表。在净出口额的统计指标选取上, 本文选择了月度贸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1YJA790014)

作者简介:朱惠(1978-), 黑龙江佳木斯人,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